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YAN'ANSHIQI
ZHONGYANGDANGXIAO

延安时期 中央党校

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整顿三风以改造思想，审查干部以纯洁组织，开展路线学习以厘清历史。

作为“掌握思想”的重镇，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完成了保存骨干、教育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任务，确立了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谌玉梅 罗平汉 /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YAN'ANSHIQI
ZHONGYANGDANGXIAO

延安时期 中央党校

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整顿三风以改造思想，审查干部以纯洁组织，开展路线学习以厘清历史。

作为“掌握思想”的重镇，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完成了保存骨干、教育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任务，确立了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谌玉梅 罗平汉 /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 / 谌玉梅, 罗平汉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7-224-11215-3

I. ①延… II. ①谌… ②罗… III. ①中国共产党—
党校—校史—研究—1935~1948 IV. ①D26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1221 号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

作 者 谌玉梅 罗平汉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15.75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1215-3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中央党校的历史沿革	1
一、初创阶段的中央党校	1
二、初到陕北的中央党校	10
三、抗战前期的中央党校	16
四、邓发任校长前期的中央党校	28
第二章 毛泽东主持下的中央党校	32
一、毛泽东对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	33
二、中央党校的组织结构	40
三、中央党校的教学改革	44
四、中共七大代表在中央党校	51
第三章 延安整风与中央党校的地位	57
一、毛泽东为何要发动延安整风	57
二、延安整风的酝酿与高层整风	72
三、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大本营”	86
第四章 改造思想：中央党校的整顿三风	96
一、毛泽东号召整顿三风	96
二、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103
三、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	116
四、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125
第五章 纯洁组织：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	127
一、审查干部是一项常规性的工作	127
二、中央党校在整风运动中的审干工作	131
三、中央党校的“抢救运动”	137

四、对中央党校审干工作的反思	146
第六章 厘清历史：中央党校的路线教育	153
一、整风前期的路线学习	153
二、路线教育的深入发展阶段	160
三、“山头会议”的召开	169
第七章 中央党校的大生产运动	179
一、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	179
二、中央党校的农业生产	184
三、中央党校的工业性生产	192
四、中央党校的商业及其他生产	200
第八章 中央党校的文娱生活	206
一、平剧的改造	206
二、秧歌剧的推广	211
三、话剧的演出	216
结束语	225
附录	226
参考资料	243

第一章 中央党校的历史沿革

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是1933年3月13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停办。1934年10月,学校随中央红军参加了著名的长征。1935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落户陕北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恢复办学,更名“中共中央党校”。此后,中央党校在瓦窑堡、保安、定边等地辗转办学。1937年2月,中央党校迁至延安,进入了比较平稳的发展阶段。

一、初创阶段的中央党校

1933年3月至1934年10月,是中共中央党校(当时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初创阶段。这一时期,中央党校在任弼时、张闻天、李维汉的相继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干部。当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中央党校在办学过程中也存在着某些不足。

(一) 早期筹备过程

中央党校的创办,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筹备过程。就现有文献来看,最早提出设立党校问题的,是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此次会议所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①这是中国共产党主张成立党校的最早记载。

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重申了这一主张。会议通过的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明确规定：“党中教育机关除支部具其一部分作用，另外于可能时更有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讨论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①

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四届中央执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又详细讨论了创办党校的问题。此次会议通过的《宣传问题议决案》，首先重申了“开办各地党校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其次，还根据中共实际情况提出了开办以下两种形式的党校：一是“各地委之下的普通的党校”，主要培养群众运动的鼓动员，学习时间至多不过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二是“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主要培养“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时间不超过三个月。《议决案》还就党校教育内容、方法作了相关规定。^②

此后，为督促各地执行此决定，中共中央又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如1925年12月的《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十月北京扩大执委会决议案若干解释》、1926年3月的《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关于二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1926年7月的《关于宣传部议决案》、1926年9月的《中央通告第十八号——配合北伐年内各地应完成的十六项工作》以及1926年12月的《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等文件，都强调了设立党校的问题。

从实践层面来看，为贯彻中共中央决定，1925年10月至1927年初，北京、上海、广州、长沙等地都创办过党校。如在北京，中共北方区委就曾在北京大学三院二楼开办过党校，时间是1925年10月至12月。该校校长由罗亦农担任，有学员100多人。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上，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在此报告中，陈独秀明确提出“我们党目前需要成立党校”，并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中央想成立一个党校，二、各个地区也想成立党校。如果中央成立党校，讲师会更好一些，而如果各地成立党校，会更方便一些。据我看，前一种意见较好。中央有个计划，打算成立一个设立两个部并拥有五百人的党校。总之，这项工作现在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在武汉坚守住，我们就在这里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9—530页。

成立党校。”^①在此,中共中央要求成立中共中央党校的意图已十分明朗。但遗憾的是,随着革命局势的急转直下,中央党校终未办成。尽管如此,中共五大关于创办中央党校的决策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导向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一度陷入低潮。但即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十分重视党校工作,并多次督促各地创办党校。如1931年4月,随着江西中央苏区的逐步稳固,中共中央在《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并强调:“要造成苏区以后把工农干部送给中央的前途,而不是专由中央供给苏区。必须把干部的培养当做是苏区各中央分局中心任务之一,坚决同那种一切依靠中央派人的观念做斗争。”关于学校的课程设置,“应该是三分之一为军事训练,三分之一为实际工作的常识,三分之一为政治经济的常识”。^②

同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决议》对“苏区的党部没有很好的利用公开的便利经常举办大规模的党校”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要求“苏维埃区域最近更需要特别去做提拔与训练干部的工作,经常利用这种公开的便利大规模的去举办各种人才的训练,如党校、政治军事学校等”。^③

1932年1月,中共中央在《给湘鄂西分局和省委的信——关于湘鄂西党目前组织任务》中更是明确规定:“中央责成你们在二个月内由中央分局直接举办比较长时(三月至半年)、比较大规模的(四十至六十个学生)的党校,责成省委及地方党部逐渐举办各种各式的训练班,如工会工作的、农运的、军事的、苏维埃的、白军兵士运动的、妇女的、党务政治的……等短期训练班,在半年后不但要达到‘干部自给’,而且要能准备一部分干部供给中央调到其他区域去发展工作。你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去达到这个目的。”^④

那么,这种由中央分局直接举办的大规模党校到底有没有成立呢?就现有资料来看,中共苏区中央局确实创办了此种党校。据《任弼时传》记载:“周

^①易福才、郑自来、陈芳国著:《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7页。

^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4—536页。

^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恩来到中央苏区(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达瑞金——引者注)就任中央局书记后,任弼时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局党校校长。”^①这里的“中央局党校”,就是指由中共苏区中央局所创办的党校。

关于此点,也可从1932年2月《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组织报告》中得到印证。报告在谈到全国白区党组织工作情况时指出:“义乌还有一个农民同志(去年春曾在中央党校受训练)在那工作,曾来过两次短信,至今怎样,不得而知。”^②鉴于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已由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这里的“中央党校”,指的应该也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党校。“去年春曾在中央党校受训练”,实际上也告诉了我们中共苏区中央局党校的创办时间,即1931年春季。具体时间,应该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后不久,这与上文《任弼时传》的记载也是相符的。

此外,1932年9月《周恩来关于前线上地方工作问题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报告》也提到:“中央局须准备以自己党校学生中三分之一派到这一线做工作,以集中火力来争取这一块苏区的扩大。”^③从此可以确定,中共苏区中央局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党校。

综上,各地区党校的创办,特别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党校的创建,无疑为后来中共中央党校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中央党校的成立

1933年1月,由于革命形势的急剧恶化,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至江西瑞金,不久还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江西瑞金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事实上,从这时起,中共中央就已开始筹划建立中共中央党校。据1933年2月10日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1933年1月3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第31次常会,“议决与中共中央局及全总执行局合办苏维埃党校,并通知各地选送苏维埃班的学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

^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5页。

生”。^① 因为是与中共中央局合办“苏维埃党校”，所以该党校实质上就是中央性质的党校，尽管名字不叫“中共中央党校”。

1933年3月12日，《红色中华》以《马克思(思)共产主义学校三月十三日开学》为题，报道了这所“苏维埃党校”的情况：“今年是马克思(思)逝世的五十周年，中央局为了纪念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鼻祖，广泛地有系统的来传播马克思(思)所创造的共产主义，故集中了党团政府工会的力量，创办一个大规模的苏维埃党校，大批训练新的工农干部，以适应目前革命与战争的需要，彻底改造和加强党团政府工会的工作，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现在这一党校经过长期的准备，就要在三月十三日开学了。”党校的班次设置有三种：“(一)新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学额原定八十人，主要的是造就新苏区与白区的工作人员，学习时间定两月毕业；(二)四月的训练，分党，团，苏维埃，工会工作四班，每班五十人；(三)高级训练班，以六月为限，学额四十人。由各省委，省苏及省工会派送。”党校的学习课程，“各班不同，主要的是马克思(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党的建设苏维埃的建设，工人运动，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常识等等”。^②

按此部署，1933年3月13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3月15日，《红色中华》报道了开学时的盛况：“正当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学了。十三日下午一时全体学生暨各机关代表均到达该校，齐集礼堂，举行极庄严的开学典礼。中共中央局，中央政府与全总执行局代表均有重要演说，勉励学生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后由校长训词，学生答词后，即宣布散会。晚上举行晚会，工农剧社表演歌舞，活报，新剧等，节目均极精彩，博得观众的热烈鼓掌喝彩声，直至十一时，始尽兴而散。”^③

为什么将1933年3月13日定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建校日呢？除了上述的史料支撑外，另一个重要根据就是延安中央党校《铃记汇集》中的记载：从1937年至1943年5月，延安中央党校一直沿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印章，

^①《人民委员会第三十一、三十二次常会》，《红色中华》1933年2月10日第1版。

^②《纪念科学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思)共产主义学校三月十三日开学》，《红色中华》1933年3月12日第4版。原文为早期音译“马克思”，实为“马克思”，下同。

^③《马克思(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学了》，《红色中华》1933年3月15日第3版。

直至毛泽东兼任校长后(指1943年3月——笔者注)才正式启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印章。目前发现的陕北期间中央党校的部分文件、图书盖的也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印章。^①这也说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共中央党校是有着直接的承接关系的。

长期以来,中央党校的建校日问题在学界都存在争议,主要存在以下四种观点:一是1926年2月24日,二是1927年7月20日,三是1933年3月13日,四是1935年12月1日。其中第一、第三种提法的争议最大。

2000年3月,《学习时报》发表了中央党校教授王仲清的《关于中央党校的校庆日》一文。文章主张将1926年2月24日定为中央党校的校庆日。^②此文发表不久,就有人对此提出疑义。同年6月,中央党校教授谢武军以《中央党校的校庆日——三月十三日》为题发表文章,公开表示反对。文章认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就是中央党校的前身,其建校日(1933年3月13日)就是中央党校的校庆日,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③对此,王仲清于同年11月在《北京党史》以《中央党校校庆日进一步考辩》为题进行反驳。文称:谢文“完全肯定了在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就是中共中央党校,这一论点,多数人是赞成的”。但作者随即指出,“我认为此点尚存疑义”。并强调,“笔者目前仍坚持2000年3月13日一文观点”。“目前了解到的,从1926年2月以来,中央关于开办中央党校的决定,就有七八次,如能把中央党校校庆日论证得更早,岂不更好!”^④

针对以上争议,2001年中央党校教授黄少群在《党的文献》发表了《也谈中央党校校庆日的确认》一文,支持谢文观点。文章对现存的四种观点作了一一梳理后,从四个方面对“1933年3月13日说”作了论证。最后作者指出:“综上所述,四种提法中只有‘1933年3月13日说’才能成立;将这一天定为中央党校的校庆日,我认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⑤

^①史言:《培养党的干部的红色摇篮——中央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创办暨建校日史考》,《学习时报》2013年3月11日第16版。

^②王仲清:《关于中央党校的校庆日》,《学习时报》(党校教育专刊)2000年3月13日第2版。

^③谢武军:《中央党校的校庆日——三月十三日》,《学习时报》(党校教育专刊)2000年6月5日第2版。

^④王仲清:《中央党校校庆日进一步考辩》,《北京党史》2000年第6期。

^⑤黄少群:《也谈中央党校校庆日的确认》,《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

2008年7月,中央党校正式启动校史馆建设后,校委提出了确定建校时间的任务。后经过大量文献考证,中央党校校委建议将1933年3月13日(即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学之日)作为中央党校的建校日,并于2011年3月21日正式报请中共中央审定。2011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复:同意将1933年3月13日确定为中央党校的建校日,将3月13日作为校庆日。从此,中央党校才确认了自己的生日。

(三) 学校概况

1933年3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江西瑞金成立,校长由任弼时担任,副校长为杨尚昆。同年4月,任弼时调任湘赣省委书记,校长改由张闻天兼任。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全国苏维埃二大后,张闻天离任,李维汉担任校长一职,直至1934年10月该校停办。其间,董必武(1933年5月至1934年1月)、冯雪峰(1934年2月至10月)先后担任过副校长一职。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最初设在瑞金叶坪乡洋溪村西南方向的满太屋。1933年4月底,由于国民党加强了对叶坪的轰炸,学校被迫迁至瑞金城西的沙洲坝黄竹堪下新斤村。1934年7月,学校又搬到云石山田心村的一个公祠内。

当时学校共设有三种班次,即新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党团苏维埃工会班和高级训练班。宋任穷、谭启龙、朱明、唐天际、罗桂华等人,就都曾在高级训练班学习过。教学方面,当时学校主要开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人运动、军事等课程,另外也教些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常识等方面的知识。“学校的教员,一是学校的领导和专职教员,如任弼时、张闻天、杨尚昆、董必武、罗明、李维汉、冯雪峰、成仿吾等都讲课,而且讲的不止一门。另一方面,就是请当时中央领导人兼任。如请毛泽东讲苏维埃运动,邓颖超讲中共历史,陈云、刘少奇讲中国职工运动史,顾作霖讲少共史,朱德讲军



任弼时

事斗争,徐特立讲地理和自然科学常识等。此外,博古、周恩来、刘伯承、瞿秋白等也都到党校讲过课。”^①因处于战争年代,所以学校还经常开展军事训练,如打靶、防空、射击等。

就学制来看,各个学员班次的实际学习时间都比原先预计的稍长。如新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实际上学了三个月,于6月14日才毕业。据《红色中华》报道:“六月十四日下午三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借工农剧社的大厅举行新苏区班学生的毕业典礼,到会者各机关各团体代表和该校学生等共数百人。”^②原计划学习四个月的党团苏维埃工会班,实际学习时间也延长了一个月,于8月13日才毕业。《红色中华》对这四个班的毕业情况也有报道称:“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的前面,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于八月十三日午后二时,举行第二次的毕业典礼,这次毕业是四月班的全体学生,共一百五十余人。他们中间的每个,都是党的积极进攻路线的坚决拥护者与执行者,他们将是铁一般的布尔什维克的干部。”^③而高级训练班,因“五一”前曾出发到各地参加纪念“五一”的活动,7月间又曾到粤赣省会昌筠门岭学习,所以同年12月12日才毕业。

当时学校还组织学术讲演,或组织学生到其他单位听报告。如1933年3月15日,《红色中华》就刊登了该校举行第一次学术演讲的消息。讲演人是董必武,讲题为《巴黎公社》,时间为3月18日上午10时(即巴黎公社纪念日),地点在该校俱乐部。^④4月2日,《红色中华》又刊登了该校举行第二次学术讲演的消息。讲演人是洛甫(即张闻天),题目是《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现在与未来》,时间是4月9日上午9时,地点就在洋溪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3年期间,学校也曾组织学生到全总执行局、红军学校俱乐部,听取唐开元、博古所作的《劳动法》《目前红军建设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等报告。

组织结构方面,学校主要设立了校部、教务处、总务处等机构。校部下设党总支、团总支;班内则成立党支部、团支部。董必武、罗明先后担任过教务主任。另外,学校还设有教材编审处,有工作人员数人,董必武为负责人。曾编

①王渔:《中共苏区中央局“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时报》2011年10月10日第16版。

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新苏区班的毕业典礼》,《红色中华》1933年6月20日第4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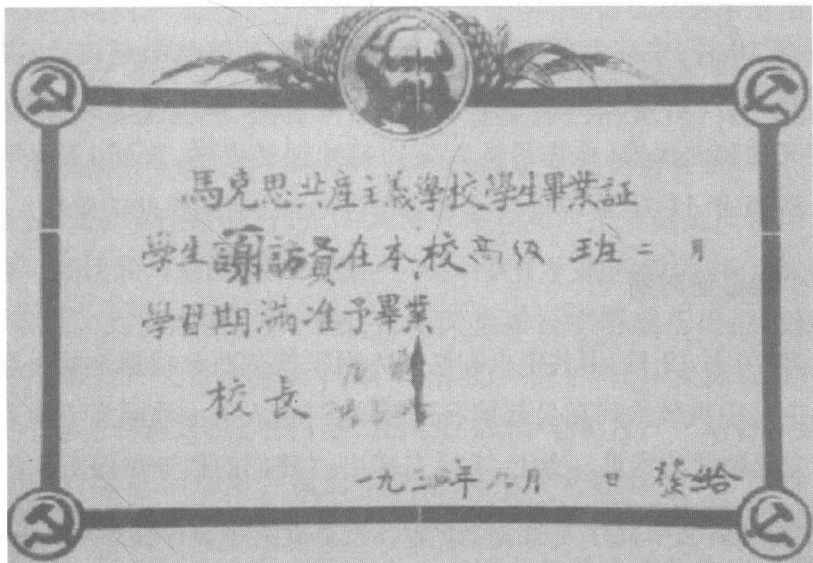
③《党校四班举行毕业典礼,又涌现出一大批党的干部》,《红色中华》1933年9月3日第5版。

④《讲演〈巴黎公社〉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启事》,《红色中华》1933年3月15日第3版。

印《列宁问题》《共产党宣言》《论清党》《政治常识讲义》等教材。

1933年这三种班次的学员陆续毕业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否还继续招收学生呢?答案是肯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机关监察委员会常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的胡嘉宾,就曾参加过1934年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高级班的学习。他在回忆江西反“罗明路线”斗争时指出:“1933年11月左右,又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开展对‘罗明路线’的批判。我也被列入‘罗明路线’的名单进行重点批判。会后就把我送去瑞金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了。到中央党校,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在那里,李维汉、博古、董必武、成仿吾、潘汉年、吴亮平等同志都给我们上过课。毛泽东同志也给我们作过调查研究的报告。这次学习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得益确实不浅。学习了三个月,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就派我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①据此可以确定的是,高级班在第一批学员毕业后,仍在办学。至于学习时间的问题,则无从考证了。

另一个有力的证明,是1934年9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正副校长罗迈(即李维汉)、冯雪峰为该校学生签发的毕业证书。证书显示,学员谢访贤在本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员谢访贤的毕业证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七大代表忆七大》(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校高级班学习期满,准予毕业。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向西转移,开始著名的长征。中央党校部分学工人员也随中共中央参加了长征。据当时的校长李维汉回忆:“一九三四年十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董必武、成仿吾、冯雪峰等党校的干部参加了长征。党校的一部分学员和由地方调来准备创立新苏区临时放在党校学习的干部,也参加了长征。这部分人员处理工作是我负责进行的。处理原则主要是两条:一是个人能力能否胜任新苏区工作的需要,二是身体情况能否适应长期行军的艰苦生活。参加长征的教职员和学员都编入中央军委第二纵队的干部队。”^①

以上是中央党校初创阶段的概况。尽管这一时期的中央党校还存在某些不足,如办学场所一再迁移等,但其在办学过程中所积累的各方面经验,无疑为中央党校以后的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事实上,瑞金时期中央党校所开创的一些办学理念一直沿用至今,如党支部的设置、请中央领导人到校作报告等。

二、初到陕北的中央党校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与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决定落脚陕北。同年11月,中央党校在陕北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恢复办学。此后,中央党校又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定边等地辗转办学,直到1937年2月进驻延安。1935年11月至1937年2月,是中央党校初到陕北的阶段。

(一) 瓦窑堡时期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抵达西北根据地的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毛泽东在会上所提出的立足陕北的意见。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②

11月7日,中共中央各机关到达西北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据李维汉回

^①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86页。

^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2页。

忆,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后,“立即恢复中央党校”。^①关于此点,可从其他史料得到互证。一是此前的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此决议明确规定:目前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加紧对于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间的基本的阶级教育,使他们能够在各种复杂的与变化的环境下坚决不动摇的为苏维埃革命斗争到底。设立红军大学与高级党校,大批的培养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②二是林伯渠的长征日记。据日记所载,1935年“十一月十九日,晴,八时党校开会,博古报告肃反工作”。^③考虑到中央机关这时刚到瓦窑堡,不可能再成立其他级别的党校,因此这里的“党校”应该就是上述决议所要求设立的“高级党校”,也就是中央党校。关于中央党校的具体恢复日期,尚未发现相关史料。但综合上述材料,可推断是1935年11月中上旬。

这时的中央党校,具体名字叫什么呢?现在学界普遍认为,中央党校到陕北恢复办学后,就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了。但事实上,由于中共中央没有统一规范,“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高级党校”等叫法恐怕也是普遍存在的。前文就提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图章一直用到了1943年5月。如果中央党校这时在校名上就有了统一规定的话,恐怕也不会一直沿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图章。

关于“中央高级党校”这种叫法,也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经笔者认真考证,发现“中央高级党校”这一叫法在延安时期也是始终存在的。这主要基于以下三点:一是1938年10月,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提纲》的报告。关于党校教育问题,张闻天在报告中明确指出:高级党校“由中央直接办理”。^④二是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一份名叫《中央高级党校教育计划——关于学习材料之三》的档案,日期为1942年4月。三是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学员回忆录。仅以中共七大代表黄新廷为例,他就曾指出:“1942年初,中共中央对中央党校进行改组,成立了中共中央高级党校。”2月

①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86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7页。

③王渔:《在陕北瓦窑堡时的中央党校》(上),《学习时报》2011年10月17日第16版。

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02页。

1日下午,改组后的党校开学时,“‘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开学典礼’的大红横幅高挂在主席台上端”。^①这里,且不论“中央高级党校”叫法到底始于何时,但至少可以确定此叫法确实存在过。



董必武

中央党校在瓦窑堡恢复办学后,校长改由董必武担任(直至1937年3月),教务主任为成仿吾,龙标贵负责党总支工作。这一时期,党校校址设在安定第二完小。当时陕北有一个苏维埃干部训练班,负责人是鲁振华和李登瀛,有学生二三十人。中央党校恢复办学后,该训练班并入中央党校。1935年11月底,因陕北“肃反”扩大化而被关押的100多人被释放出来后,有部分人员也到中央党校参加工作或学习,如习仲勋、张策等。

瓦窑堡时期,中央党校根据抗日形势的实际需要,主要办了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第一期主要是训练陕北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相应的一整套政策,包括富农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以便通过他们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第二期主要是传达和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分设三个班,由成仿吾、习仲勋、冯雪峰分任班主任,马树良、黄元庆任军事教员,同时还办了一个教员班,学员有白栋材、李景膺、吴文遴、马定邦、吉汉杰、姜旭等。”^②这个教员班一般是先由董必武、成仿吾给学员上课,然后再由学员给其他班讲课。课程方面,学校除了讲述上述的一些时事政策外,还讲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游击战争等课程。

193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还在中央党校举行过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中央党校全体师生参加。会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七大代表忆七大》(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②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86页。